

市场起源论





2 017 887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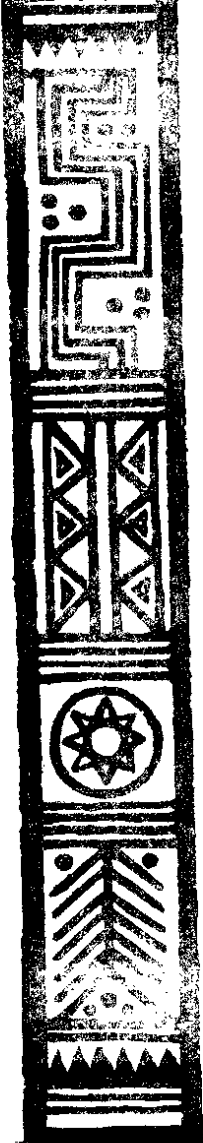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市场起源论

——从彝族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
考察市场的起源

龙建民（彝）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市场起源论

——从彝族集会到“十二兽”纪日

集场考察市场的起源

龙建民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6,000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其中精装1,000)

ISBN 7-222-00112-3/F·17 平装定价: 2.25 元



图1 赶集路上的彝族

图2 黔西北羊街





图3 旷野集场上兜售山草
蓑衣的彝族妇女



图4 滇西彝区曾行用过的贝币



图5 彝族预约的交换场地、市场的
胚胎形态——“摩格得”

图6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县华山彝族
尼颇传统集会——“插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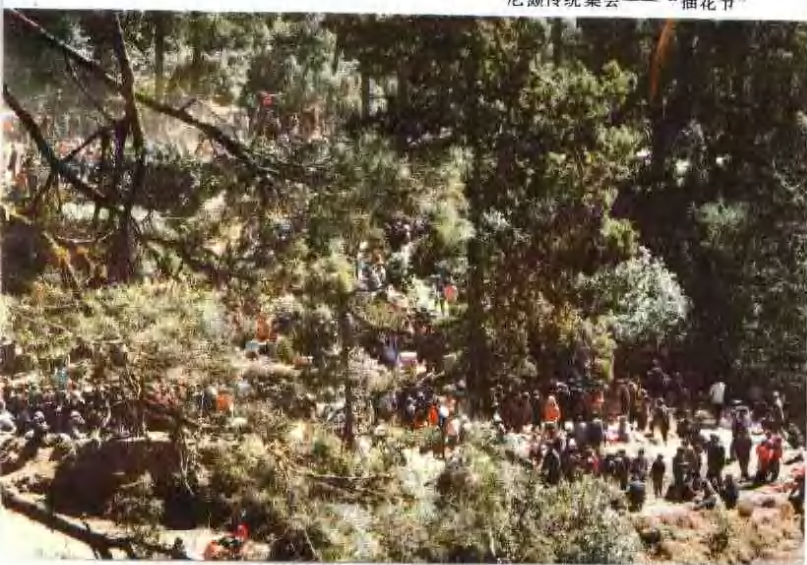




图7 滇西猫街



图 8
三月十三 集会



图 9
黔西草棚街



图10 集散棚空



图11 定居集场

图12
滇西南洞虎街



图13
天台集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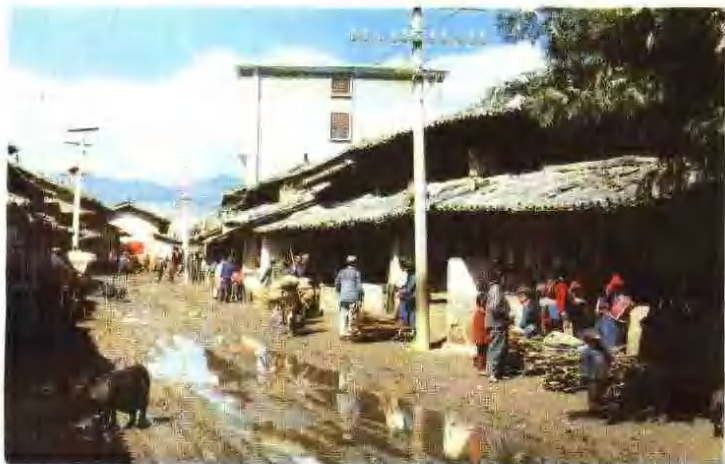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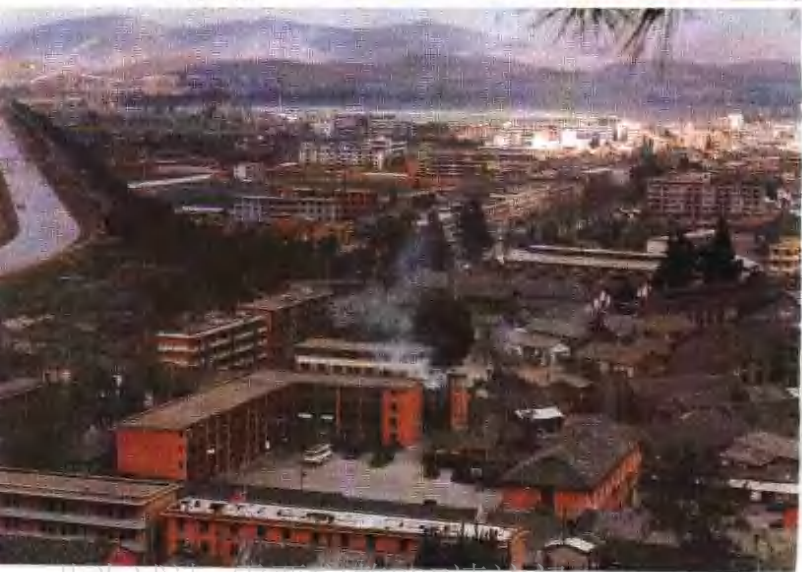


图14
楚雄彝州武定县城集
场上的土杂货地摊



图15 鹿城鸟瞰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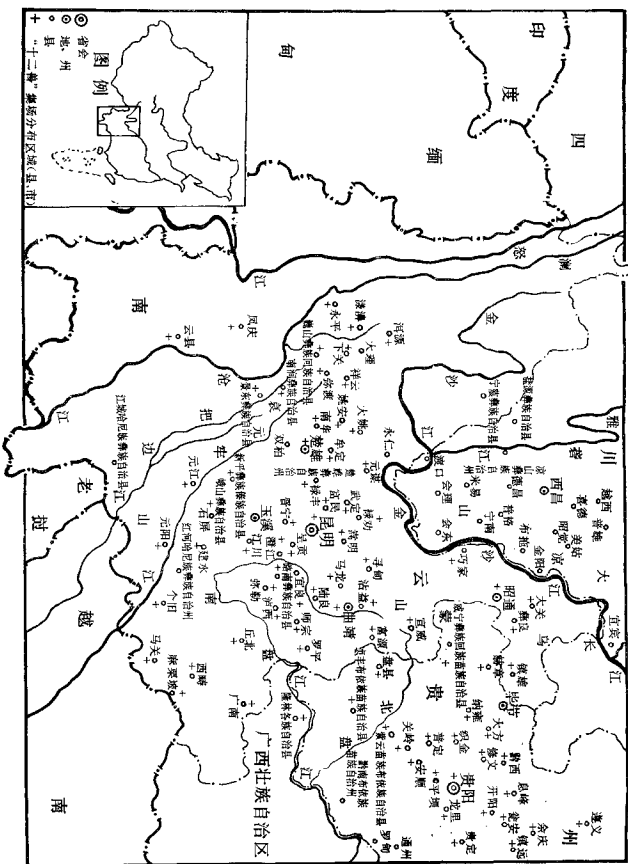
自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取代了创世说的永恒观以来，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起源为人们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参考系。然而，对当今社会影响巨大的市场，其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未开拓的新园地。

本书首次提出“市场起源”问题的研究，并探索性地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市场的起源，丰富了对市场的认识。

本书揭示：远古氏族男女外婚交往中的互赠礼物发展成氏族部落间以物易物的“访问式交换”，交换反作用于氏族内部经历了“援助式”、“馈赠式”或“访问式”交换等形式；原始共同体解体，交换便成为“碰巧性交换”，从两人偶然碰巧的聚会交换到无数买卖双方共同聚会交换之间历史地经历了“集会集市”的中介环节而后脱离集会形成集场；集场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结构性，它曾与政治、军事中心城堡融合为古代的城市；从古代发展到现代，城市已成为市场的基本社会形式。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就是以城市为实体的国内的和跨国的市场网络。

最后，本书指出市场化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滞后民族迷恋先进民族的现实并把它作为自己可以寄托的理想是不明智的；与其仿效别人的成功模式，不如自己依靠市场，从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中捕捉发展与创新的机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途径，更合乎当代市场化生活的潮流。

彝族与“十二兽”集场分布图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总 序

刘尧汉

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南侧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的乌蒙山和云南的六诏山（乌蒙山脉的分支）、哀牢山、蒙乐山；北侧分布在四川、云南的大小凉山。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就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境濒临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元谋县。彝族是我国滇、川、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历来只凭书本治学的地方史家，都说彝族是从西北甘、青迁入的古羌戎（或古氐羌）与当地土著融合的遗裔。自从不久前考古发掘出亚洲人类共祖“元谋猿人”，从两可说，甘、青古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元谋猿人的子孙散布于全亚洲乃至从中国东北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大陆，为当地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至于迁往甘、青为远古羌戎，则继续往两塔里木盆地越过葱岭，往东迁达山东半岛而为远古炎帝神农氏和周代所封齐姜（即羌）；这便很自然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①同样可说，汉族的先进文化是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维族）、吕振羽四大史家，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8页。

致认为，如果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写好中国通史。目前尚健在的史家白寿彝同志（回族）所写巨著《中国通史》，也具有强烈的同样观点。然而，如果依旧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的写法上，尽管具有如上所述的正确观点而无具体的新内容，要写出一部包括各族新资料的中国通史，只是空话罢了。所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根据哀牢山一个彝村的实地调查所获新资料写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的一份手稿，寄请范老审阅。我和范老从未面识，他写了《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史学》专刊上，将拙稿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范老的用意在于鼓励青年做研究工作，不宜只停留在书本上兜圈子，还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实地调查，寻觅现存的活史料，以补书本之不足。范老的勉励，一直鼓舞着我坚持走实地调查的道路。倏忽三十年，我已年逾花甲。所幸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近年来我带领彝族男女青年往返于金沙江两侧滇、川、黔三省山谷间，曾大雨淋漓乘骑入哀牢山，顶烈日爬鲁魁山（属六诏山脉），冰天雪地徒步登乌蒙山，不分冬夏往来于川、滇大小凉山，为的就是寻访“山野妙龄女郎”。至今“山野女郎朱颜在，鬓白男翁志未衰”。

1984年2月上旬，我把拙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一书“概要”，寄请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审阅并请他属序（我和蔡老亦未面识），他在序题为《中国各民族的血统与文化》^①的序中，开头便说：

现今研究中国通史尤其是上古史，原始社会史部分，再也不好停留于书本上了，不仅要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相结

^①载《文汇报》1984年4月9日第三版。

合，而且要到兄弟民族地区去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把书本与出土古器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有王国维与其他考古家；把书本与社会历史调查结合起来研究的，后面我要说的刘尧汉教授就是其中一例。

他又正确地指出：

社会历史调查的材料，比之书本的材料，是一种未成文的活史料，这种后史料有时要比死史料更能说明问题。至少也是可以互相参考的。

蔡老在文中末段又说：

现在云南省成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尧汉教授以彝族学者而兼任所长，真庆得人。彝族是我国现在占人口较多数的兄弟民族之一，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有了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历史，才能写出其正能够代表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通史之类的著作。中国文化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各兄弟民族文化专史的基础上，也同于中国通史必须建立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史的基面上，这就不待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蔡老把我与王国维相并提，我不敢当。蔡老十分谦虚，他以年近八旬（1905年11月10日生）的高龄，看了族著之后，还说 he 更加不满足于过去书本材料，而期望“趁机补课”。在他给我的信里说，当年（1984年）暑假，他很想往面南山区一游。因身体条件，未能成行。这反映了民族学资料即活史料的价值，日益为其他学料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同样，我们从事民族学的人，也要更重视研习其他学科，以开阔自己的视野。

1985年3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教授，为我与卢央合著《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一书所写序言中说：

我们常说，历史学有三重证据：一是文献，一是考古，一是民族调查；第三者尤为重要，因为它是过去历史的重现，是时间的倒转，是转瞬即逝的良机。

他在序言的末段中又指出：

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蔡老和杨老，南北异居，不约而同，对于民族学、各少数民族史、文化史、彝族文化史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成果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其正确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彝族共有545万人口（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居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的第四位（一壮；二维；三回），历来被视为文化落后；因而在文化上的地位，或许是在第四十位之后了。彝族的文化既然落后到这样的地步，我竟然要主编这套《彝族文化研究丛书》，而写书的人多是彝族青年，并未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只是高等院校、大专、中专毕业的青年。

我却认为，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干实事；能获得高等院校的文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水平。那么，怎样衡量水平呢？我的浅见是：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其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我们编的这套丛书预计二、三十本，除了我和卢央副教授各自写几本，两人合写两本之外，大多数是我指导的青年们写的。写作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从调查研究出发，以获得新资料（活史料），再与书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在比较研究中使知识系统化，从中得出新观点，进而寻求具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便是科学论文和专著产生的过程。我就这样带领新战